

历史上人类社会对大学的期待
组织文化与课程
从中世纪到现代
大学教育的三个源流

探究取向与古典取向
博雅教育的历史发展

大学教育力

金子元久◎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术性真理探求的理念

研究的出现
美国模式大学教育的形成
通识教育的诞生

大学教育力

金子元久◎著

徐国兴等◎译

苑复杰◎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教育力 / (日) 金子元久著; 徐国兴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5617 - 6708 - 5

I. 大… II. ①金…②徐… III. 高等教育—教育改革—
研究—日本 IV. G649.3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1442 号

大学教育力

撰 著 金子元久
翻 译 徐国兴等
审 校 苑复杰
责任编辑 彭呈军
审读编辑 李小娜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 - 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苏州市永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0.7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6708 - 5 / G · 4100
定 价 2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通读日本学者金子元久的新著《大学教育力》中译本之后,获益匪浅。以下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出发,简单谈谈我所理解的该书主要内容和其中蕴含的借鉴意义。

在现代社会里,高等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而难于把握。这种模糊主要来源于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条件变化而产生的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为此,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之前,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高等教育的相关人员都不得不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中,高等教育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二)如果高等教育确实起着某种必不可少的社会作用,那么,促使这种作用顺利发生的机制是什么?(三)如何改革才能保证高等教育能够完善机制,发挥上述社会所需要的功能?(四)高等教育改革得以顺利实现的基本条件是什么?这些是当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日本自然也不例外。日本东京大学金子元久教授的专著《大学教育力》就试图根据日本的国情,从学术上回答上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看似不言自明,其实尚无定论。日本有些民众认为“大学就是游乐园”。虽然公众、政府和高校都从各个方面对大学教育的问题展开过深入探讨,但是并没有形成明确而统一的认识。金子教授认为,大学的教育力量就是大学教育对学生的影响。这种力量不仅受制于大学方面的教育工作,也取决于学生们在知识和意识方面所作的准备以及希望通过大学教育获取的东西。从这两个角度可以把大学生分为四种类型:(一)高度匹配型。此类学生很有自信,对于将来的展望十分明确。同时,大学施教方的意图与学生的将来展望保持一致。这类学生最能够回应教师的意图,教师们在上课时也最容易被这些学生的要求和反应所影响。教育体制在整体上也会自然而然地为进一步符合这类学生的需要而发生变化。(二)有限认同型。这类学生的自我和社会认识程度很高,但由此所形成的“准备”与大学教育的意图却未必一致。对于他们来说,大学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关口,毕业以后的努力才是实现自我的手段。他们对学习并未投入太多的精力,而将时间主要用于兴趣小组活动、志愿者活动和打工等方面。因为日本企业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并不作任何期待,所以这样的学生反而被企业积极地招收进去。(三)被动接受型。这类学生的自我认识和对将来的展望未必清

晰,因此他们并不清楚大学教育的目标,但正因为不清楚,所以对大学教育抱有期待,并主动地按其要求去做。虽然学生无法明确自己的要求,但是如果大学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的话,他们反而有可能会变得非常具有批判性。(四)疏远型。这类学生的自我和社会认识尚未确立,而且与大学教育的意图之间的符合程度也较低。因此,他们对上课并无兴趣,往往在兴趣小组活动中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大学拥有较高的教育力量就意味着,一方面向高认同的学生施加着深远影响,另一方面进入其“射程”之内的学生也有相对较大的规模,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大学教育形成了如下特点:课堂教学以研究为主;控制学生学习的正式机构缺乏;学生隶属组织在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这是日本社会和高等教育制度发展的客观产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可是现在拥有上述特点的日本高等教育开始变得不太能够适应社会要求,其原因在于社会的知识化、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化和入学适龄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为此社会要求大学探讨改革途径。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包括逻辑、传达和意志等三方面的基础能力。而成为改革中心问题的就是如何发挥“教养教育”在核心能力形成中的作用。因为原始意义上特别是古典主义的博雅教育(即日本的教养教育)均把培养基本能力作为目标。但是日本一直没有能够建立起完善的提高学生教养的博雅教育体系。发展教养教育的方向之一是提倡扩张性专业。扩张性专业是指用广阔的视野定位各个专业科目,包括能够赋予专业以明确意义的教育内容的专业科目。为此有必要综合地设计各科目的授课目标、授课方式以及学生的学习方法等。这要求学生的主体性参加和深入体验的获得以及校方合理建构学习框架以实现教学课程和过程的综合化和流动化、体系化和标准化,有利于学生动机的形成和学习内容的意义化等。但是大学教育力量的强化需要一定的组织基础,这包括大学组织的治理机构、教学监控和财政基础等三方面。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大学的整体管理机构必须明确本科阶段教育的职能与目标,形成教育改革的综合方针,然后把学部这样的纵向分割的教育组织横向地贯通起来。与此同时,强化系统的自我评估,这是大学教育力量强化的先决条件。而且,大学教育力量的强化需要很多资源,日本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不甚理想的原因正是其低费用结构和该结构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带来的后果。所以必须进一步增加用于高等教育尤其是教学改革的财政投资。

本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理论角度而言,作者厘定了很多一直比较模糊的高等教育学上的基本概念,比如博雅教育和核

心能力等,给读者以智慧和启发。而且,从不空发议论,所有的议论均建立在翔实的史料或实证调查的数据基础之上。从实践角度而言,如上所述,本书探讨了在21世纪初日本高等教育进入后普及化阶段、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大学教育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未来发展远景。在书中,作者从大学的理念、组织制度、课程架构以及学生的学习行为等多个层面进行考察,并结合历史发展、国际比较以及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角,综合而深入地阐述和剖析了大学教育的历史、现状、挑战,以及克服挑战,重塑和提升大学的教育力量的途径。同时,书中几乎所有论题都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同样面临或即将可能面临的问题,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比如,书中强调通过博雅教育和教养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这和我国现在教育界主张通过通识教育来培养学生素质的观点非常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金子教授所指的教养教育体现在课程上是指扩张性专业,换句话说是在建立在专业教育基础之上的教养教育。而我国专家的主张多体现在加强公共课和基础课教学上。这也给我很大启发,让我再一次深入思考北大和我国一直进行的本科教学改革,比如北大元培计划等。金子教授还认为改变本科教学的组织结构和方式、强化大学评估尤其是教学水平评估、增加用于教学的财政投入是提高大学的教育力量的基础条件。他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和改进的基本措施都和我国现在的情况有着某种程度的近似。

最后想说的是,金子元久教授是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的老朋友。近年来,他非常关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曾多次受邀来访就某些具有高度关注度的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作专题学术演讲,并担任我国多所著名大学,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多篇论文和专著已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期待本书也能对我国今后的高等教育研究和改革产生其应有的借鉴意义。

闵维方
于北京大学
2009.03.28

中文版前言： 面对时代的呼唤

回首 20 世纪的高等教育发展,那无疑是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规模急剧扩大的时期。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期,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各国,进入高等学校的青年人的比例迅速增加,如果把短期高等教育(相当于我国的专科教育——译者注)包含在内,其入学率目前已经达到 70% 左右。相比而言,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虽然相对较迟,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才出现,但也很快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个人所掌握的知识 and 技能,不仅会影响个人一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将来。为此,社会期待大学未来能在促进社会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

但是,时至今日,大学教育却受到来自社会各方的严厉批判。比如,在日本,人们指责“大学是游乐园(leisure land)”,尤其是企业界对大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知识和技能不抱任何期待。近年来,随着大学入学率的迅速提高,大学生素质下降,部分大学生甚至不具备一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大学如果仅仅通过入学考试筛选一部分人和给予他们所谓大学毕业的标签,那么这实际上只不过是一项浪费巨大的社会工程而已。

尽管受到严厉批判,但目前大学教育看不出本质变化的迹象。也许是因为升学需求依然远高于高等教育机会供给,高等教育机会供求关系仍然是卖方市场。从高校角度而言,学术伦理是其存在的合法基础,和社会对高校的要求相比,大学组织和作为其组织基础的大学教师个体更注重学术研究伦理。对于学生家长而言,他们首先重视的是子女能否进入大学读书,而在大学中能学习到什么知识和技能则位居其次,甚至漠不关心。

对企业,特别是日本企业而言,传统的做法是看重聘用高素质的年轻人,然后以培训教育(OJT, on-the-job training)的方式向他们传授本企业所需技能,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企业不必对大学教育抱太多期待,相反,如果不断强调“大学教育无用论”也许有利于企业以较低的薪酬雇用大学应届毕业生。由此看来,大学教育的存在方式是大学适应社会经济形式的一种客观结果。

中国和日本正相反,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所采取的高

等教育模式如下。大学教育所传授的是高度专门化的知识和技能,毕业生根据其所学到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中去。在这种体制下,大学教育直接被有机植入经济生产活动之中。大学教育的有用性是不证自明的客观现实。但是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也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实际上,大学的专业和毕业后职业之间的对应关系逐渐变弱。虽然如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条件下,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能够找到较好的就业岗位,所以,大学教育的质量问题反而没有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

不过,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出现巨大变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经济国际化和知识社会化。科学技术发展导致人类知识急速增多,这不仅意味着尖端技术的数量增多,还意味着学科知识之间相互关系模糊化。因此,如何吸收新知识和培养新一代就成为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国际化也使人、财、物国际流动的壁垒逐渐消失。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单纯取决于大规模的设备和资本积累,变得更多依靠科学发明、新技术和新服务理念。在这种形势下,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就越发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人们越发期待大学能够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其次高等教育扩招本身也引发了各种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急速上升,在学业能力和学习积极性上,与传统高校学生不同的群体成为高校校园里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同时,老龄化使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都受到了严重挑战。即使是必要的经费投入,政府也开始强调效率。最后,青少年自身也出现了很多本质变化。高考竞争不再是激发中学生学习动机和保障高校入学者质量的重要因素。上述因素要求大学教育进行改革。

当然,针对上述形势各国也采取了应对策略。在激烈的生源竞争的背景之下,高等院校将完善教学功能作为其重要任务,大学教师的危机感也日趋强烈。与象牙塔式的传统大学观念不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大学形象确实开始发生变化。不过,上述努力时至今日还没有结出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关心也越来越多。比如,在日本,以社会一般群体为读者对象的杂志,屡屡以“有用大学”、“有利于就业的大学”和“物美价廉的大学”等为醒目标题以吸引读者眼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心。但是,这种高度关注的背后还有很多课题值得注意。究竟什么是大学教育的功能?如果说大学教育的功能是向学生传授在今后工作中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那么企业

首先应该明确有关新员工的知识技能要求,但是现实中无法找到这样的例子。可以说,社会各界是以一种极为空虚的形式关注大学教育,这种关注度越高大学教育越危险。所以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是,社会和大学双方对大学教育的目标和功能要形成明确而统一的认识。

大学教育质量的改革不仅在日本和中国,在欧美各国也是重要的政策课题。随经济发展而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使重构大学理念、组织和行为模式成为当务之急。虽然各国视美国高等教育为大学教育的理想模式,但美国高等教育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因此有必要把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放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来讨论。总而言之,高等教育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当前大学教育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保障是什么?本书将对上述大学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日本大学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希望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贡献。

最后,深深感谢中国学术界的同仁,不仅感谢你们为本书中文版的顺利出版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同时也感谢在长期的学术交流中,你们带给我的诸多启迪。

金子元久

于日本东京大学

2009. 03. 20

中文版序—— 东亚的大学教育模式： 中国、日本和韩国

从国际比较的结果来看,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这种共同特征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和欧美各国相比,社会一般民众对进大学读书的期望值非常高,因而,大学入学率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就开始大幅度上升。第二,由于选择上大学的学生大幅度上升,围绕大学升学就产生了非常激烈的高考竞争,这进一步给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以巨大影响。

研究者历来认为这些特征的产生是因为东亚各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笔者则以为不然。更接近客观真实的应该是这些共同特征源自东亚各国现代化的近似方式。东亚各国虽然各自具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也具有高度成熟的文化,但是却没有能够产生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因此,作为权宜之计,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不得不导入欧美的知识和制度。以这些新型知识和制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最终通过向国际市场输出工业产品而迅速发展壮大,进而成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但是这样的发展方式使这些现代企业部门(日本称为财阀系大型企业,中国叫做外资企业,韩国则名之为输出企业)和传统的生产部门之间产生巨大差异。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被这些现代企业部门所雇用正是提高个人生活水平的一条捷径,而进入这些部门工作的条件就是高学历。顺便说一句,在现代社会里,在普通民众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诸手段中,教育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孕育了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相互联系的一个独特范式。与其说入学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如说两者同时发生,其结果是短期内达到了世界上少有的高度教育水准,这反过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同时,高强度的高考竞争,其影响波及高中、初中甚至小学教育,催生了东亚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进而促使学生能够掌握高度的知识和形成高度的能力。众所周知,在国际上举行的 TIMSS 和 PISA 等学生知识能力水平调查中,韩国和日本学生的成绩经常占据鳌头。从这一点来说,东亚各国的发展经验在向人们讲述着一个成功的动人的故事。

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成功故事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非常大的问题。

第一,这样的发展模式,也许可以说实现了数量的扩大,但未必能够说实现了质量的提高。在上述机制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日本高等教育入学率在20世纪60年代大幅度升高,时至今日,仅仅四年制本科院校的入学率就已经在50%左右,如果把短期大学也计算在内,则入学率已经超过70%。韩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从时间上来说虽然较日本稍微晚了一点,但也已经达到和日本同样的水平。现在,在日本和韩国,没有受过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反而在社会上是少数。时代已经发展到一半以上的年轻人都能到大学读书的新阶段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时间来得更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的初期,大学入学率才有了飞速提高。

美国高等教育学者马丁·特罗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精英阶段,第二是大众化阶段,第三是(机会均等)普及阶段。而且把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50%看作到达普及阶段的基本指标。如此看来,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而日本和韩国已经步入普及阶段。

但是如此数量的扩张往往很容易掩盖质量方面的问题。虽然家长和子女也许是为了美好的将来把考上大学作为奋斗目标,但是这未必是为了让其接受更好的教育。企业也愿意雇佣大学毕业生,这是因为考上大学意味着具有较高的基础能力,但未必意味着企业高度评价学生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

从大学内部来看,对于教师个人来说,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这未必能够带来教育质量的提高。在通过高考竞争而形成的大学威望序列中,大学越是有名气越没有进行教学改革的动力,相反,越是无名的大学越愿意进行教学改革。可是,无论没有名气的大学如何进行教学改革,其努力和地位总是得不到社会承认。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对于个体大学来说,并不明白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教育质量。

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中,数量扩大化和质量空虚化并行不悖就是迄今为止东亚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

第二个原因是青年人的变化。如上所述,因为美好未来和高考成绩之间的对应关系非常明确,所以家长很容易说服子女相信学习的必要性,子女也很容易接受,而且,学校和社会全体也把青少年时代应该学习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对于社会阶层相对较低的家长来说,其子

女这一代如果要跨进中产阶级的行列,高考的成功就是必要条件。同时,对于已经走入中产阶级行列的家长来说,如果子女高考失败,就意味着将来仍然会有从中产阶级坠落到社会底层的可能。希望或恐怖攫取了家长和子女的灵魂。

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文化结构有其不健康的一面。由此而生的社会危机感表现在东亚各国的社会生活中就是多次尝试改革高考制度和考试形式。但是只要高考竞争位于上述社会发展结构的核心地位,那么任何改革就不仅不能促使现状有所改善,相反,还会使问题复杂化,使局面更为混乱。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大学适龄人口在20世纪的90年代至21世纪初迅速减少,这样,尽管大学入学率在上升,但大学的学生收容能力整体上还是逐渐出现了过剩。如果不对具体大学挑挑拣拣,那么上大学实际上就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通过高考竞争催生学生学习动机的社会机制慢慢就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可以想见,不远的将来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肯定也会发生。

但是更为深刻的问题是青年的人生观和未来期待也在发生很大变化。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富裕,但是正因为此,追求进一步的物质丰富的欲望就减弱了,社会开始追求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价值观。同时,处于生长发育途中的青少年不得不自己摸索,因为习惯了考试竞争这样一元化社会价值观的父母、学校和社会无法向他们提供充分的支持。而且,在国际化的大潮中,由于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不断变化,“将来”变成了一个充满危险的词汇。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也无法形成对自己将来的明确期待。

上述青年价值观的变化并不局限于日本和韩国。美国 and 欧洲等先进工业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上述问题。只是由于日本和韩国具有上述支撑现代社会发展的社会结构,没能明确意识到青年人价值观的变化而已。

与此相比,中国还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之中,因而整个社会仍然显得朝气蓬勃。在农村地区,如何解决温饱问题还是政策的核心。所以,青年人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会上升流动的欲望。可是,在城市地区,由于社会富裕程度急剧增加,加之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施行,青少年人口比例逐渐下降,导致青年人的价值观和生活理想已经发生变化。因此青

年的意识今后会发生显著的本质变化。

第三个因素是国际化。特别是在韩国和日本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产品输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但是在其他方面却是通过形成和外界隔离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而实现的。世界经济发展不允许其中存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形态,要求它们以前只进行某一单一产品贸易的对外窗户开放得再大一些。这就会引起社会经济全体存在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导致矛盾和混乱的产生。和这两个国家相比,中国一开始就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政策,通过吸引外国企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跳跃式发展。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经济竞争实力是建立在转换欧美出现的发明和模式的基础之上,并把它在生产中实用化,同时强调生产效率得来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转换直接和经济竞争力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前沿的研究就成为一个关键因素。同时,随着企业活动的国际化,必须进入拥有不同制度和文化的社会中,和它们打交道,并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寻找孕育新商品和新市场的可能性。而且需要组织企业活动,把不同文化的个人统一到同一个企业活动中。这就不仅要求派往国外的工作人员,即使在国内的一般白领阶层,都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从这一点出发,韩国和日本的产业界认为它们的大学毕业生能力上有缺陷。同时,海外工作经验得来的复杂感受和中产阶级面对国际化的不安心情在韩国以社会对英语教育强烈关心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如果仅仅把这个问题看成是社会对学生英语会话能力提高的关心,那就未免把这个问题看得过小了。表面上是看重外语能力,但是本质上是人们认识到,外语能力背后的理论思考能力、开放型社会交际能力以及对多元文化所具有的兴趣和动机等,都是支持今后本国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如此看来,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教育,尤其是其中的高等教育正面对教育本质转变的压力,这也是三国在新的经济发展周期内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高等教育本质变化的焦点正是教育如何才能给予学生实质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的教育力量就成了改革的关键词汇。

那么,如何才能增强大学的教育力量?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的高等教育当然可以作为我们改革的重要参考。美国的高等教育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进入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变化、大

学组织的改革和教育实践以应对其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学习借鉴具体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学习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作为整体应对时代要求灵活进行改革的能力。

但是也必须认识到,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建立在其固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美国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日本的1.6倍,韩国的2倍(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07)。这说明美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共同认识,那就是不仅学生家庭,包括整个社会都要负担高等教育的财政。这和美国这个国家建立在新教伦理这一宗教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民主主义思想有密切关系,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在美国高密度大学教育的理念基础和通过大学教育能够改变学生的个性等思想中都能找到宗教理念的影子。

在这个意义上,在东亚各国建立和美国同样的高等教育制度作为目标不仅不现实,也不是社会所期望的。东亚各国的高等教育必须站在现有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之上,摸索适合新时期的高等教育形式。

在这一方面,还必须看到的重要一点是,东亚各国的高等教育实际上也存在着多样性。虽然如前所述,从国际比较的结果来看,韩国、中国和日本的高等教育之间具有共同的特征,但是三国的高等教育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各自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毫无疑问,三国高等教育之间还具有相当多的差异性,具体到大学教学方面也是如此。

如本书中所述,上溯中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历史,不难发现,在大学教育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三个潮流。第一,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法学、神学和医学的专门职业教育模式。在这个传统中,作为教育对象的知识具有和专门职业密切对应的体系,建立在这个体系基础上的考试于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第二,产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在中世纪的英国大学中被体系化,在美国得到长足发展的博雅教育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目标是以古典为中心的各个学科的教学和学习为媒介实现知性的形成和发展。第三,以19世纪初柏林大学的教育理念为代表,提倡对未知学术进行探索的大学教育模式,这被称为洪堡教育理念。在这个模式中,在追求“学术自由”和“学习自由”的思想哲学之下,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美国高等教育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借鉴和包容上述三种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个性的高等教育模式。

从这个视点来审视三国的高等教育,也能发现很多本质差别。在东

亚各国中,在现代大学出现历史最早的日本,其高等教育发展的初期阶段,大学作为专门职业教育机构的性质非常明显。但是到 19 世纪后期 20 世纪初期,受到德国洪堡大学教育理念的强烈影响,结果形成了教师全是研究者和学生应该自主学习的理念。在战后的教育改革中,虽然高等教育转向了学习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但教师是研究者和学生是自主学习者这一信念一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尤其在大学教师队伍中影响力相当大。

韩国的大学教育在二战前具有和日本类似的特征,但是战后受美国大学教育的影响非常大。首尔国立大学的教育组织、课程设置与美国州立大学的教育模式具有极强的共性,私立大学受美国大学的影响也很大,一部分私立女子大学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博雅教育型的大学教育。加之很多韩国研究生留学美国,回国后成为韩国的大学教师这一点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如果看一看韩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实际状况,就可以发现美国的本科教育还是有一点不同,好像还能看到洪堡教育理念的影子。

中国也在 19 世纪末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一方面,作为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直接引进了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和洪堡教育理念,也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日本而引入。另一方面,也能看到来自美国教会大学影响的强烈痕迹。但是促使中国真正形成现代大学基本制度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中国所进行的大学建设事业。在这次大规模的大学建设事业中,模仿苏联高度分化的专门职业教育体系,然后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发展。在这个体系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大学的专业领域和专门职业上的对应关系,学生在进校时就决定专业,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和专业相对应的职业中去。大学里的教学内容是完全标准化的课程,不存在科目选修的空间,考试也很严格。在其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出于对上述教育模式缺点的反省,进行了有利于促进学生广泛学习的教育改革。但是,应该说,专门职业教育的思想仍然在中国的现实教育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量。

上述各种大学教育模式,很难简单说孰优孰劣。但是,这些差异的存在也足以说明,东亚的大学教育虽然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限制不得不进行某些相同的改革,但是确实可以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不过,不同的大学教育模式产生不同的学生学习模式,同时拥有其固有的教育效果和内在问题。如果能够掌握关于三国大学教育的实证数据并进行比较,

是否就可以为探讨东亚大学教育的合理存在形式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呢？

在这个意义上，就中国和日本的大学教育进行对话，不仅在专业研究者之间，而且扩展到高等教育实践者、政策制定者以及社会全体，对研究两国高等教育走向 21 世纪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期望本书能够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

前言： 大学的教育力量

一、大学教育无用吗？

目前，日本年轻人中，有40%能够进入四年制本科院校学习。随着经济社会知识化和国际化趋势的日趋明显，毋庸置疑，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不仅对个体职业生涯发展有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日本社会整体的未来发展趋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期待大学能在开拓社会未来前景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但是，截至目前，日本的大学教育却受到了来自社会各方的严厉质疑。“大学是游乐园”一语被世人普遍接受，部分企业界人士表示对于高校学生在校期间所接受的大学教育不抱有任何期待，甚至人们指责由于近年大学入学率的迅速提高，大学生的质量出现明显下滑，并且部分学生基础学业能力薄弱。如果高等院校的功能仅仅局限于入学考试筛选和所谓大学毕业标签的赋予，那么可以说，日本的大学正在进行一项巨大的浪费工程。

最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受到来自社会的各种批判，日本的大学教育却并没有作出根本性的回应和变革。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大学升学需求者的数量依然保持着持续上升的势头，升学需求远高于高校吸纳学生的能力，这种供求失衡的结构为大学安于现状提供了温床。

除此之外，造成大学教育囿于现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是建构在学术逻辑基础上的组织。相比于社会的需求，大学组织或者其中的大学教师个体，他们的行为更倾向于遵循学术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规律。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社会从某种程度上也认可了大学的上述特殊性，这种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大学教育对社会需求反应的滞后性。对于学生家庭而言，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子女能否进入大学，其次才考虑究竟在大学中学习什么。而对于日本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选拔雇用高素质的年轻人，企业自己投资，以在岗培训教育的方式向年轻员工传授企业所需技能，并最终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因此，从这一意义而言，企业没有必要对大学教育抱有太多的期待，相反不断强调“大学教育无用论”，反而有利于企业以较低的薪酬雇用大学应届毕业生。